

20 世纪中国人体育认知的轨迹

从“师夷长技”到“民力富强之本”

熊晓正 曹守诤 林登轅

鸦片战争的惨败，极大地震撼了素以“治国平天下”为使命的士大夫阶层。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被炮舰的震撼抛离了“华夏中心”的传统思想体系，“睁眼看世界”，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以御侮的方策。但在“夷夏之辨”的喧嚣声中，向西方学习举步维艰。19 世纪 60 年代，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掀起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然而，1896 年的“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粉碎了国人的自强梦。在痛定思痛的反思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高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旗子，鼓动以制度革新为目标的“维新变法”，开始了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介绍。正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引入了西方体育某些内容，并对这一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进行理性认识。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

“南京条约”订立后，魏源在复仇雪耻的激励下，编辑了《海国图志》一书。他在序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编写此书的目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呼喊出了亘古未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在《海国图志》中反复指出，只有学习和掌握西洋人的先进技术，实行新兵招募办法，采用新式练兵法，注重提高官兵的素质，才依托的理论预设。因此，要通过文献调查，尽量多掌握一些有关社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社区结构变化，人口构成变化和人口变动，以及人们观念变化等方面的资料，为这个预设奠定基础。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预测是困难的，而正因为困难才使预测显得更加重要。

现地调查是针对社区体育现状进行的调查，可考虑如下内容：a 社区体育在自己所在市、区中的位置；b 社区成员对体育需求的程度；c 社会各阶层参加体育活动的实态；d 影响体育运动开展的主要因素；e 各种体育设施利用的情况（利用的程度、主要利用者、影响利用的原因等）；f 体育指导站、活动点、体育俱乐部、协会等组织的活动状况及存在问题；g 各种指导者的指导现状及问题；h 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运动会、竞赛、讲习班、野营等）的人们的特性、倾向及问题；i 单位体育活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等等。

在实施一次全面调查之后，以上内容就没有必要年年都进行全面调查了，可根据计划期的长短，每年有所侧重地进行调查。

③实施注意要点

18

有可能改变目前所处的状况。然而魏源等人的主张，有如空谷足音。直到遭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开明的官僚们才记起 20 年前魏源的主张。弈沂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自上而下地推行了历时 30 余年的洋务运动，企图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求强求富以自救。

1. 兵操的引进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洋务派改革军事，仿照西洋军队编练新式军队，以洋枪、洋炮、洋操为主要训练内容。1861 年 1 月，奕訢、文祥等人奏请在八旗兵丁中使用枪炮。1862 年正式在天津成立了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从北京选派年富力壮的官兵赴天津参加训练。后来又先后在上海、广州、福州等地按“天津练兵章程”分别成立了洋枪队，并陆续推广到沿海和沿江各省。至此以后，练习枪炮和“洋人阵式”渐成清军建制。西洋兵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进的。兵操训练，最初主要聘请英、法、美等国军官充任教习，训练内容为英美兵操。1896 年以后，则以德、日兵操内容为主。1898 年，清政府明令精练陆军一律改习洋操。为了培养自己的统兵将帅，洋务派还采取选送出国学习与集中轮训的办法，以解决教习不足与推广兵操训

a 在现地调查和资料分析基础上制定的社区体育计划，一定要取得市或区政府当局的认可与支持。

b 发展社区体育、制定计划的根本宗旨是为了社区全体成员的健康与幸福。既然如此，就有必要通过传播媒介等的宣传，让社区成员知晓计划，理解计划，从而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

c 会同市或区政府的其它职能部门（教育、文化、卫生、城建、环境、财政等）以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的组织共同负责计划的实施。

3. 计划的评价

所谓评价，一般泛指衡量人或事物的价值。这里所说的计划评价，是指以某些形式检查计划的结果，进行“好、一般、不好”等的价值判断。对社区体育计划的评价，可分整体评价和局部评价两个方面。整体评价，是指对计划的结果进行全面的评价；局部评价，是指对计划中的某一项指标（例如，体育人口的变化）进行的评价。在进行量与质评价的同时，还可以对评价的结果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

练。当时,兵操主要训练内容是:列队、刺杀、战阵等练习,也开展单杠、双杠、木马、平台等器械体操作为辅助练习。

在实践中,洋务派一方面感到训练(洋人)与指挥(中国人)脱节,造成训练、作战指挥的混乱;一方面也耽心军队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便在派“艺童”和“艺徒”分赴国外留学的同时,兴办军事与军事工业有关的新式学堂,培养自己的训练、指挥的基层军官。从80年代开始,一大批军事学堂应运而生,象有名的北洋水师学堂(1880)、天津武备学堂(1885)、广东陆师学堂(1886)、南京水师学堂(1890)、湖北自强学堂(1893)等先后建立。在学堂里,兵操训练是不可或缺的功课。其内容较军队练习更为丰富,学习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跳远、跳高、爬桅、游泳、滑水、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等。

洋务派在编练新军与兴办相关的军事学堂时,引入了西洋兵操,标志着西方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开始传入了我国。

2. 夷夏之辨

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做法,引起了顽固派极大的不满,他们祭起“夷夏大防”、“用夷变夏”、“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灵幡,对洋务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先秦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被儒学大师们用“内夏外夷”四个字界定了。于是有了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的称谓。在传统士大夫官绅们的头脑中,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心,中华典章制度广惠四裔,使四方的“蛮夷”趋于进化。因此,“华夷之辨”概莫大焉。尊中国,攘夷狄,明纲常,正道统,乃万世不易之理,治国平天下之道。然而,洋务派居然弃家传祖制而拾西洋人之末技,岂不大谬。顽固派说:“近日学西方者,多糟粕程朱,秕糠孔孟,赞美夷人,以为事事胜于中国,用夷变夏,即可自强,此大误也。……今我方舍旧谋新,而彼乃广购经史,教其国人诵习,我专学彼人之短,彼尽得我之长,则强弱之势愈悬,猾夏之祸愈烈,不数十年,衣冠礼义之邦,将成兽蹄鸟迹之区,此鄙人之大惧也。”连西洋人都奉我们的典章制度为“圭臬”,努力搜求和学习,我们为什么还要沉迷夷俗,师事夷人呢?对当前严峻的局势,顽固派不无乐观地声称:“中国之道,如洪炉鼓铸,万物都归之一治,若五胡,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分辨也。他时(指洋人)终如此。”君不见历史上五胡乱华,入主中原,契丹、女真横被河北,结果如何,还不是被我中华文明所感化而皈依“圣学”。“天不变,道亦不变”,别看洋人现在器器然,其皈依“圣学”只是早晚的事情。再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且不论奉洋人为师会不会教你真本事,即便教的是真本事,“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恃术数而起衰振弱者。”顽固派以“内夏外夷”的“国际”秩序、“用夏变夷”的历史故事和“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为理论依据,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使洋务派穷于应付。

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面对时局的险峻与顽固派的攻击的两难,洋务派一方面耐着性子,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我们面对的“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那里还能援引“尊周攘夷”的故事呢?就是尧舜生于今日,也“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老祖宗教导我们,“夫天下耻莫耻于不如人”,既然西洋各国的船坚炮利,我们学学又何妨?人家骑骏

马,我们何必非要安于骑驴呢!再说,我们祖上不是也有“胡服骑射”么,“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是仿效老祖宗学习西洋人的技艺而保卫“圣道”而已。一方面抛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纲。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肇始于郑观应。1892年他在《盛世危言·西学》一文中,既批评了“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把提倡西学西艺的人斥之为“仕林败类”、“名教罪人”的所谓“正人君子”,同时也批评洋务派的“师夷”(向西方学习)是“剽窃皮毛”,被一些好名嗜利的人所利用,谈得很热闹,“亦实不能知其所强盛之所以然”。他称这种学习是“无本之学”。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这便是后来洋务派奉为圭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滥觞。他们将“中学”与“西学”用“体”(也有称之为“本”)和“用”(也有称之为“末”)加以区别。张之洞在其《劝学篇》里对此作了界定与诠释。他指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据“旧学”的某些缺陷,再选取“新学”有关知识,以补其不足。他特别强调地指出:“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因此,“旧学”必须摆在根本的、主要的位置上,而“新学”仅仅是它的补充。并断言“西学必先由中学”。

洋务派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其政纲,其基本理论依据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他们反复向世人说明,也是向守旧派表白:“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在他们看来,西方的优势在于“器用”,是讲求富强的权变之数,是应变之策,是“用”是“末”;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纲常名教,才是中国之“体”、之“本”。就“器用”而论,西洋胜于中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就“道统”而论,中国远在西洋诸国之上,中国数千年来立国的根本,正是西洋诸国渴求的。因此,决不能动摇、改变。向西方学习,只不过“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目的是取西方的长处,用来为保卫“圣学”服务的。这就是所谓“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洋务派虽然清醒地认识了时局,但他们在思想深处,仍未摆脱“道艺”之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仅仅把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看成是摆脱当前困境的手段或应变的临时措施。而没有从根本上去反思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封建纲常制度。尽管他们提倡并积极引进西方科技,但骨子里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烙下的“道本艺末”的胎记,则丝毫没有改变。对任何危及“纲常”的言行,他们都会本能地做出强烈的反应,并时时刻刻都在提防西学、西艺对封建道统的吞噬,从而将向西方学习严格的限制在实用技艺的范围之内。在向外国学习与保卫“圣道”之间,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们很象一个跌入水中而又严守礼教的封建妇人,求生的本能使她在这一紧迫关头不得不抗拒“男女大防”的古训的束缚力,而把手伸向一个可以把她从水中救出的男子。然而这一特殊场合下对礼教的背离,仅具有狭窄的自我限定性质,一旦这位妇人依靠避害反应脱离险境之后,“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训条又会重新束缚她的思想和行动,回到原来生活轨道。避害动机对某一正统原则的冲击作用,决不可能成为她对整个旧

的价值体系全面批判和反抗。因此,洋务运动过程中引入的部分西方近代体育的内容,是作为练兵的附属物,作为一种实用的练兵手段而被接受的,“师夷长技”是一种被迫临时性应急选择。他们对“兵操”等近代体育活动本身的社会意义和它们背后的学理,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变革,根本一无所知,基本上没有体育的概念,更谈不上对体育的认识,近代体育某些内容的开展也局限在军队和与军队或军工有关的少数学校。

尽管如此,观念禁闭之门,毕竟被“师夷长技”的呼号与实践撕开了一道口子。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地现代化跋涉。

二、“民力富强之本”

甲午战争一役,使由洋枪、洋炮、铁甲舰装备的,堪称当时世界海军第八位的大清帝国水师,竟在同一向唯中国是从的日本交手时灰飞烟灭。从此,西方列强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开始在中国兴建企业、修筑铁路,以直接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与此同时,还采取公开的军事掠夺手段,夺取租借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掠夺浪潮。诚如康有为所言:“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面对甲午战败后的惨烈局势,国人在震惊之余,对以“自强”“自救”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进行了反思,方觉“西人之强者在兵,所以强者不在兵”。开始探究隐藏在西洋坚船利炮等技艺背后的东西,即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西洋诸国的富强?

1. “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

1862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就从中国人与日本人访问欧洲的不同着眼点而预言:30年后,日本将兴,中国将弱。他说:“日人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也。”历史不幸被俾斯麦言中,不同的学习方式,果然在30年后使中日强弱对比发生了逆转。然而,对俾斯麦当时的预言,在国内应者寥寥。直到1892年郑观应才对洋务派的“学习”方法提出诘难。他指出西方诸国的“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他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而已,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他认为求“富强”的根本,在善于学习,而学习则必须知其“本末”(或“体用”)。“本末”有大小之分,大而言之,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小而言之,则西学自身也有“体用”的区别。他说:“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是西学之“体”;轮船、火炮、洋枪、铁路、电线等是其“用”。而我们的学习则是“遗其体而求其用”,纵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而果能致强致富么!不仅要学习“西艺”,更要提倡“西学”。并认为西学的真谛在于保证教养得法,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畅其流的运作体制,是我们应当重点学习的。

郑观应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洋务派单纯的“器用”观,涉及到政体改革等制度文明问题。这反映出当时部分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统一。那种仅袭其形式而置内容不顾,其形式也不能发挥其效力。因此,要求在学习“西艺”(技术文明)的基础上,也要学习“西学”(制度文明),以保证“体用”一致,使先进技术真正发挥出效力。这就朦胧地提出了制度文

明的改革问题。但郑观应毕竟根基于“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之上,尽管他对时局的认识与应付时局的对策比同辈人更为清醒,更切合实际,由于缺乏新的思想武器,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绕了一圈,最后仍然没有摆脱“道器”之辨的价值观念,还是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巢臼之中。但他提出的“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的观点,则使其同辈耳目一新。

2. “变亦变,不变亦变”

以康梁为首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只盯着船舰、枪炮等有形的器物,而是一开始着眼于探寻“西人之所以强”的原委。他们从列强们既争夺又联合的兵战、商战中,深深地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中庸”、“仁厚”之道的时代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拾起这一强权主义的学说,作为批判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思想武器,为其变法维新鸣锣开道。

他们针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申言:“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他们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它是一个渐进而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淘汰过程。一个民族的兴衰,取决于他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态势。人类文明在进化过程中存在一种“文化势差”,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总是选择那些进化程度高的强势文化,而进化程度低的物质、精神文明,要么融入进化程度高的文明之中获得新生,要么被时代抛弃而成为历史的遗存。历史上的匈奴、五胡也好,女真、蒙古也罢,他们之所以最后皈依“圣教”,是由于他们的文明进化程度低于中原民族的文明进化程度。用他们的原话说就是:“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然而其无法也,始以自治则有余,迨既入中国而为之君也,必不能弃中国之法”。简言之,在其部族中尚可,要统治中国就还得靠中原的制度文明。当今之世,尽管我们有数千年来积累的文物典章,有灿若神明的物华天宝,然而“经时久而无修治精进之功”,与西方列强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在“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面前,“以言四千年文物,俯然有不终日之势者”。今日之形势,不仅“用夏变夷”徒为空谈,就是华夏文明本身也面临覆灭的危机,这决非“杞忧”之论。“天下大势,尤水之东流,夫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故“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是向日本学习,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变法维新以致强;是象印度,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中,沦为他国之殖民地而被强变之;还是象波兰一样被列强瓜分而灭绝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生死存亡问题。

3. 变法须知本

维新派用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用夏变夷”,为变法维新张了目。他们不仅认识到“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从“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变法”必须“挈其领而握其枢”,抓住根本。否则,就好比梳理丝麻找不到头绪越弄越糟,“百举而无一效”。他们指出,最迟从1862年我们就开始向西方学习了。为自强、自富,我们引进了一些新东西。为了介绍西洋各国的情况与与外国人打交道,开办了翻译署,设立了同文馆;为了掌握西洋富强的秘密,也派了不少人出洋考察与留学;为了能与西洋的军事威胁相拮抗,编练了新军、兴办了海军、引进了洋操;为了不让权柄操于

他人之手，也兴办了工厂、开采了矿产、修建了铁路、开通了邮电、设置了海关；这些举措，大部分都是“西洋以富以强之基”。然而，到了我们手上，为什么就象淮南的蜜桔移植到淮北，就变成苦涩难咽的枳子了呢？不能象西洋或日本那样富强起来呢？他们认为造成这种“淮桔成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变事”而未“变法”。康有为在给光绪的奏折中说：“今数十年诸巨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认为30多年的洋务运动只学习了西洋致富致强的皮毛之事而不暗西洋诸国富强之本。这就是郑观应所批评的“遗其体而求其用”。结果事倍功半，求富反而致贫，求强反而罹难。但维新派并未停留于此，他们指出导致这种结果的指导思想，就是郑观应本人倡导而被洋务派奉为圭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政纲。

他们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之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体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有什么样的物质本体，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作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异于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颠倒错乱不知其非。这就是数十年言变法，不仅“利未一见，弊已百出”的问题所在。

那么，“变法”之本何在呢？维新派指出：国家是由众多的百姓组成的。如果把一个国家视为一个人，国民就是这个人的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世上没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瘳，筋脉已伤，血轮已涸的人，还能活在世上。也没有民众愚昧怯懦，柔弱不振，混浊涣散，而民族富强，雄居于世的国家。一个人想长生久视，不可一日不讲“摄身之术”；一个国家，想独立于列强之中，也不能一日不讲“强国之术”。“强国之术”何为？梁启超指出：“吾今以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维新派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国民素质的改善，这是致富致强之根本。而国民素质的改善，关键又在于教育。然而“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利禄诱使天下俊杰沉迷于“八股”之中，又何以能学习西学、西艺呢？因此，学校兴的前提就是改革“官制”，从政体改革入手，鼎故革新，维新变法，废科举，兴学校，为培养“非常之人才”以“济非常之变”。

4. 民力富强之本

其实，郑观应、张之洞也有过“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和“西国之强，强以学校”的主张，认识到国家的富强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他们与康梁等人的分歧在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张之洞等将培养目标的基点定位在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伦纪纲常的基础上，其任务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圣道”。严复称这种学校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提出人才的培养与造就决不能沿习旧例，必须另辟新章。

维新人士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精神，高扬起保种、变法、维新的旗子，提出了“新民”的培养目标和“公德、进取、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冒险、尚武等16项综合素质”的要求。

严复指出西洋人以体魄强健、聪明智虑、公民意识的强弱来判断民种之高下，形成了“浅智慧、练体力、厉德行”的教育

纲要。改革教育，不仅仅在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更重要的还须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确立适应新时代的教育纲要。他说：“教育分为三宗，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三育并重”。新的教育应以“尚公、尚实、尚武”为宗旨，“德育当主于尚公，体育当主于尚武，而尚实则推智育当之。”由是，“新民”的培养必须“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严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浅智慧”与“练体力”调换了位置，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纲要。

首先是“鼓民力”。严复说：“民力者富强之本”，“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此乃古往今来，中外皆然的事实。西洋占有希腊罗马崇尚剽悍的体魄而大兴“体操院”，近世又提倡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日以精审，健身壮体不仅风行男性世界，也流行于妇女儿童。西人有言曰：“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反观中国礼俗，古代尚有“壶勺之仪，射御之教”，练民形骸，鼓民血气，以示不忘武事。但至近世，倡言皓首穷经，耻于劳形践行，文弱之态，风行于世；加之鸦片与缠脚贻害国民，致使民族体魄日渐羸弱，体质日趋退化。求富求强丧失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因此，教育必须首先抓住“民力”这个根本，从改善民族体魄入手。

其次是“开民智”。“民智为富强之原”。近世以来，中西对智力的要求有着较大的区别：西洋人提倡怀疑精神，对任何事都喜好追根溯源，奖励标新立异，贵在自己创造；中国人则提倡“述而不作”，言不离古人之训示，行不逾圣贤之楷模，教不过古人、圣人、大人之微言大意的阐释，学不出“四书五经”之纲常。在学习方法上中国人重读书，倡训诂，强调书本知识的掌握，而忽视实验与实践，读书唯上；西方人则重实验，倡实践，强调能力的培养，读书倒在其次。除了这些区别外，加之“八股取士”，更进一步将人禁锢于程朱理学的小圈子里，学非以致用，这就造成“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习之人难求”。因此，必须以西法来“开民智”，以求致富致强之原。

第三是“新民德”。中国自秦汉以来，统治者就一直把民众视为家奴，可以任其驱使，对国家的管理不过象放牛放羊一样，故称之为“牧民”。不仅皇帝把国家视为一姓之私有，就是老百姓也认为国事不过是皇帝家事而已。尽管儒学先贤们一再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诲，但对大多数的“黔首”而言，则信之渺渺。因此，国人常重私利而轻公利，重家法而轻国法。加之皇帝一旦坐稳，总怕他人窥视其皇权，故又有安分守己，中庸平和的训导，以及善恶有报，处世勿争的劝诫，形成了尚克己而减竞争的道德原则。西洋人则崇尚自由，以言出必行定道德之高下，鼓励竞争，重视培养“赴公战如私仇”的公民意识。因此，必须重新塑造理想的人格模式，提倡重自由，言平等，尚竞争，贵自重的社会公德与尊私权，倡公战的国民意识。

严复说：“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无当也。”

在维新派看来，强国之本不仅仅在“师夷长技”，更重的还在于观念、制度的改革。观念、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人种的改良，即改变国民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提高国民的公民意识。蔡得强调说：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

（下转第14页）

起来,聚起来的财也会流失。

5. 五个关系

找市长与找市场的关系。过去,体育界曾有过要不要面向市场、走向市场的争议。经过实践,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了。现在又有一种担心,就是体育面向市场,走向市场,还要不要找市长的问题?其实“找市场”并不排斥“找市长”(国家投资)。“产业化”不同于“市场化”,“产业化”是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来组织运作、发展体育事业;“市场化”是完全按市场价值规律来组织、运作发展体育事业。“产业化”离不开市场,但不是一切都通过市场,完全以市场为取向。只是有条件、部分地进入市场。因此,体育除了从社会第一次分配中获得部分补偿外,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还必须从社会第二次分配中得到补偿。就我们国家而言,体育投资的人均水平是很低的。国家今后仍然要根据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按一定比例增加对体育的投入。但国家的投入,重点是放在一些基础性建设、基础性研究,以及一些尚无条件走上市场的奥运项目。大量的体育活动,其具体运作,则主要依靠社会,依靠市场。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找市场”与“找市长”的关系,“找市长”,更多的是要政策、要规划,而把经费筹集的主要着眼点投向市场。

主业与副业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化进程,必须要从认识上与实践上处理好“主业与副业”的关系。从实际工作的角度看,体育产业可分为三大类:即本体产业、相关产业与体育部门办的其它产业。在体育产业的起步阶段,需要通过发展体育的相关产业和兴办其它产业来积累发展资金。从国外的经验看,发展体育产业,也不光是只经营体育劳务,也搞多种经营。因此,我们不主张在推进产业化发展的实际工作中,自设藩篱,把我们的手足束缚起来。但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决不能主次不分或主业、副业不分。应当清醒地注意到,在体育部门的经营收入中,其主要经营项目和收入是出租场地、房屋,经营餐厅、宾馆,兴办公司、商店、工厂,这类“多种经营”收入,占体育创收的比例较大。因此,需要逐步引导“多种经营”围绕体育本体产业的开发来进行,为经营体育提供配套服务。体育产业化必须以“本体产业”为重点,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这是社会分工的要求,也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因此,“本体推进”就是说要以体育自身的经营为主,推动产业化发展,争取在本世纪末“本体产业”的收益占一半以上。“全面发展”是指在发展“本体产业”的基础上,也使相关产业与体委部门办的其它产业都获得发展。不要把“本体产业”与“多种经营”对立起来,也要防止用“多种经营”冲击乃至取代“本体产业”。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在体育产业发展中,必须处

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我们提倡经济效益,但我们反对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效益,要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体育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发展体育产业也不能偏离这个大方向。发展体育产业,注重经济效益,绝对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原则。近些年的实践证明,有了社会效益一般者会有经济效益。如上海虹口体育场,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上海人说:“要踢球,到虹口”,他们免费向青少年提供场地服务。这不是说他们不赚钱,他赚钱不是从场地本身上赚,而是围绕踢球的服务附加费上赚。他们将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很好地揉合在一起,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我们要学习他们打开大门,培育市场,服务民众,发展自己的精神。一定要坚持两个效益一起抓,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益是为社会效益服务的”效益原则。

理论研究与大胆实践的关系。目前体育经济工作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感觉到的东西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缺乏理论指导,体育产业的发展将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甚至会走弯路。理论研究要走在实际工作的前面。我们强调理论研究要超前,不是说等理论研究好了,政策完善了才去实践。理论来源于实践,但理论研究不是被动地反映实践,而是要指导实践。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提倡大胆试,大胆闯的实践精神,另一方面要提倡科学精神,组织好政策理论研究。

培育市场与管理市场的关系。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加快体育产业发展步伐,必须大力开发体育经济功能,提高全社会的体育意识,引导全社会的体育投资,拓展体育消费渠道,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和培育体育市场。在体育产业起步阶段,应形成“放水养鱼”的市场氛围。但开发、培育体育市场,并不等于放松和放弃对体育市场的管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行为都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培育体育市场与管理体育市场并举的方针,走边培育边管理、在培育中加强管理、在管理中积极培育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委作为行政部门对体育市场的管理主要依靠法律、经济的手段。随着体育产业的开发和体育市场的逐步形成,对体育产业政策和市场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各级体委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和《体育法》的法律授权,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定工作,以促进体育产业的开发和体育市场的培育始终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上接第 21 页)

力之基础。而国民素质的改良则必须从教育入手。这首先需要改革传统的社会观念,确立以“尚武”为核心内容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其次,“废科举,兴学校”改革传统的教育体系,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第三,改革传统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贯彻体育、德育、智育三育并重,体育为基础的教学原则。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实现增强民族体力、心力、群力,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实现强种进而强国的目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实则与

他们的主张和理想存在较大的距离。

但是,坚冰毕竟打破,船帆毕竟张扬,中国人对近代体育毕竟有了初步的认识。强种以强国,强种以富国的选择,将国民素质的改善大书在改革的大旗上,也把“体育救国”镌刻在了中国民族解放的路碑上。